

以巴圖魯之名—— 關於清代巴圖魯勇號的歷史與記憶

林士鉉

「巴圖魯」一詞流行於清代，曾是當時君主為褒獎軍功所賜的名號，因「巴圖魯」意為勇士、英雄，直接音譯自滿語，讀如 baturu，因而有「巴圖魯勇號」之稱。這個語詞其實源遠流長，有其內陸亞洲背景。本文析論清朝使用巴圖魯勇號的特殊歷史機緣，並且對照滿文辭書之釋義，說明巴圖魯如何成為反映滿洲政治文化特色的主要賜號；而即便改朝易代，巴圖魯仍在小說、戲曲裡直接成為勇士、英雄的代稱。「以巴圖魯之名」做為歷史記憶，也成為藝文作品表現清代滿洲特色和滿族原鄉情懷的重要元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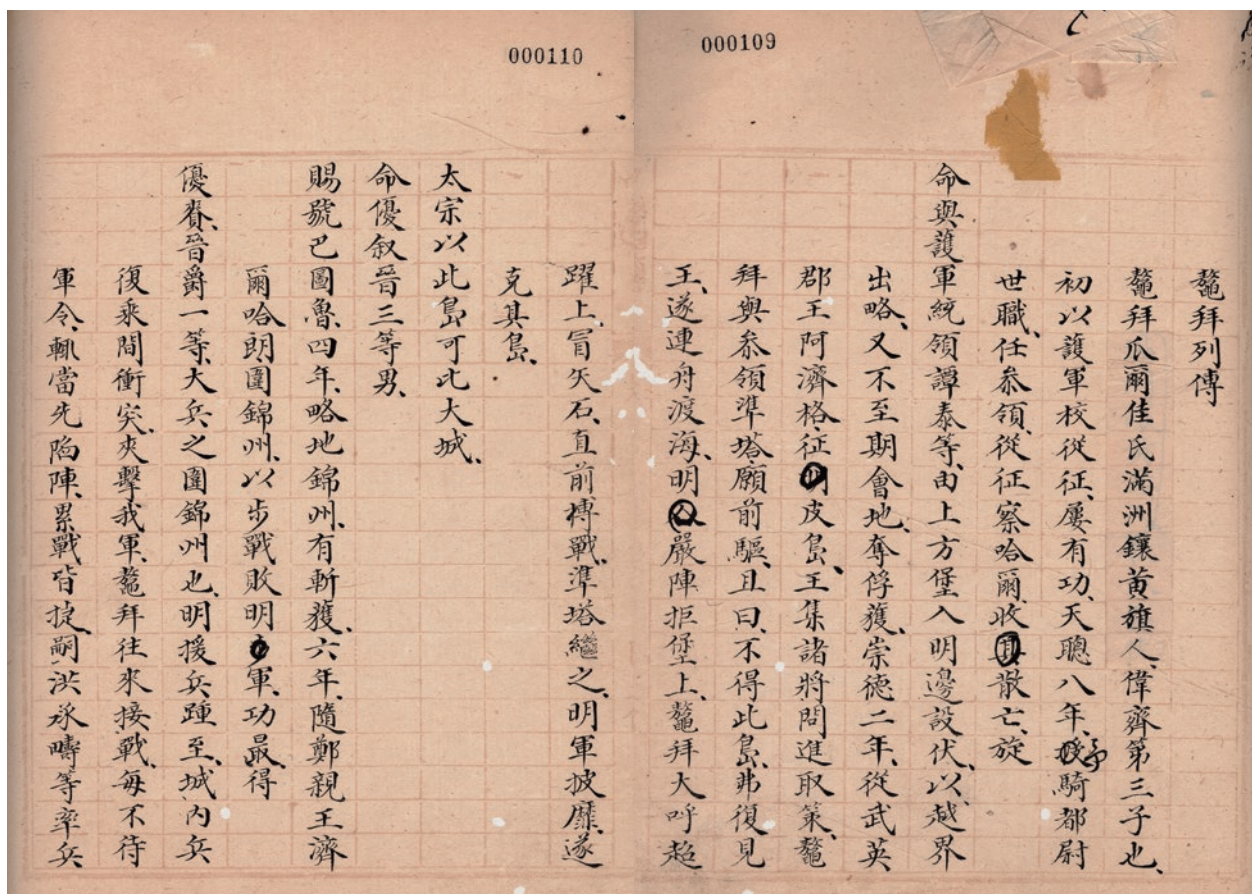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1-1 清 《欽定國史大臣列傳正編》 卷 36 〈鼇拜列傳〉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傳 005690

滿洲第一巴圖魯

金庸（1924-2018）著名的武俠小說《鹿鼎記》將清初開國元勳戰將鰲拜（瓜爾佳氏，1610-1669）描述為「滿洲第一巴圖魯」，而他是康熙皇帝（1654-1722）的輔政權臣，皇帝感怒不敢言；小說中的虛構主角韋小寶滑頭滑腦、機智重義，他協助皇帝生擒鰲拜，之後又在其禁所殺死鰲拜，自此更成為皇帝的寵臣；韋小寶參與抵抗俄羅斯入侵，皇帝升他為一等子爵，並賞賜「巴圖魯」稱號，還讓他調動「奉天」兵馬，連施琅（1621-1696）都奉承他的威名，說他「手刃滿洲第一勇士鰲拜，把滿漢第一勇士的名號搶了過來，因此欽賜『巴圖魯』勇號，武勇天下揚名。」¹ 透過小說人物所說的巴圖魯、勇士等詞彙代換，即使沒有特別說明巴圖魯是滿語讀如 *baturu* 的音譯，也能明白理解其勇士、英雄之意涵。

事實上，以鰲拜為中心的滿族口傳故事（滿族說部）在瀋陽、吉林一帶流傳百餘年，《鰲拜巴圖魯》滙集諸多清朝開國傳奇。² 鰲拜確實曾獲賜「巴圖魯」，並且晉封公爵，權傾朝野，小說情節雖有虛構，然多次使用滿洲第一巴圖魯之形容並不為過；清朝賞賜勇號之制其歷史記憶可謂因《鹿鼎記》的流傳而延續。

鰲拜於清太宗皇太極（1592-1643）在位時即屢有軍功。崇德二年（1637），從武英郡王阿濟格（1605-1651）出征皮島，曾連舟渡海，冒矢石搏戰進擊，終克皮島；該島具有重要軍事地位，太宗即以「此島可比大城」，特別優敘，晉「三等男」爵位，賜「巴圖魯」號；而這只是他一系列攻城掠地的戰功里程碑（圖1）。³ 值得注意的是，鰲拜的巴圖魯勇號的戰績是攻克可比「大城」的皮島，故攻城建立首功應是受賜勇號的主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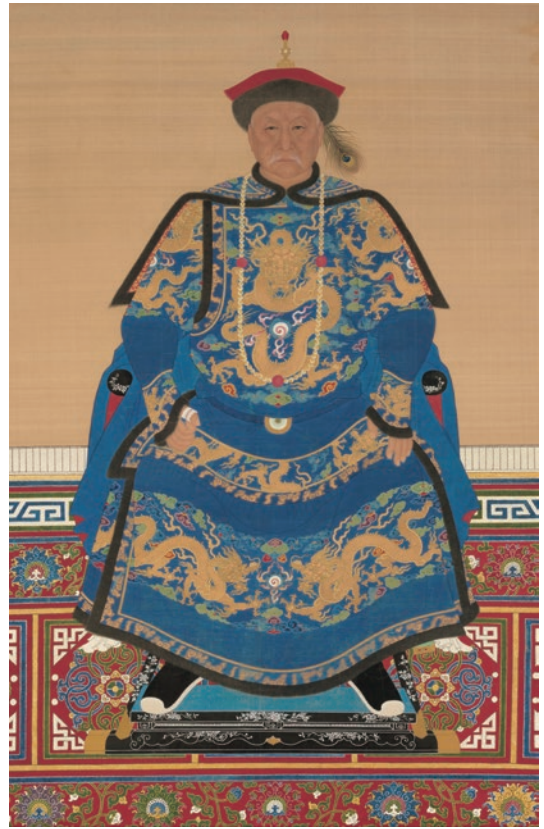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1-2 清 18 世紀中至 20 世紀初 鰲拜朝服像 軸 Arthur M. Sackler Gallery, Smithsonian Institution, Washington, D.C. 藏 取自 Jan Stuart, Evelyn S. Rawski, *Worshipping the Ancestors: Chinese Commemorative Portraits*. Stanford: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, 2001. 98.

然而，即便關於鰲拜做為滿洲第一巴圖魯的歷史記憶確有史實根據，巴圖魯勇號並非始自鰲拜。以下接續說明滿洲勇號之初始狀況。

誰是大清巴圖魯一哥？

禮敦巴圖魯（生卒年不詳）是清初最早具有巴圖魯勇號的愛新羅覺家族成員。他是太祖努爾哈齊（1559-1626）的伯父，據《清史稿》記載，由於去世較早，具體事蹟缺載，而勇號與其名字並稱，連同追封的武功郡王爵位，成為紀念其做為開國英雄的依憑。

太祖時期，額亦都巴圖魯（鈕祜祿氏，

1562-1621) 是最先獲勇號之人，為開國五大臣之首，《滿洲實錄》搭配圖像，說明他號為巴圖魯的戰役是萬曆十五年（丁亥，1587）八月，攻取巴爾達城（今遼寧清原縣境）時，以繩約軍士，魚貫而渡渾河，夜薄其城，率驍卒先登，被重創不退，終拔其城。更早之時，萬曆十一年（癸未，1583），太祖起兵為殺祖、父之仇人，

尼堪外蘭（?-1587），額亦都從征討，攻圖倫城（今遼寧省新賓滿族自治縣一帶），先登。額亦都因具體的攻城軍功而直接賜號，官方史書留下圖文記錄，做為勇號一哥當之無愧（圖2）。

清代滿洲巴圖魯勇士的形象歷時多變，「騎射」是其典型，兼用長矛、火槍（圖3-1）；然而，追溯金代女真武士，也有馬上雙手持長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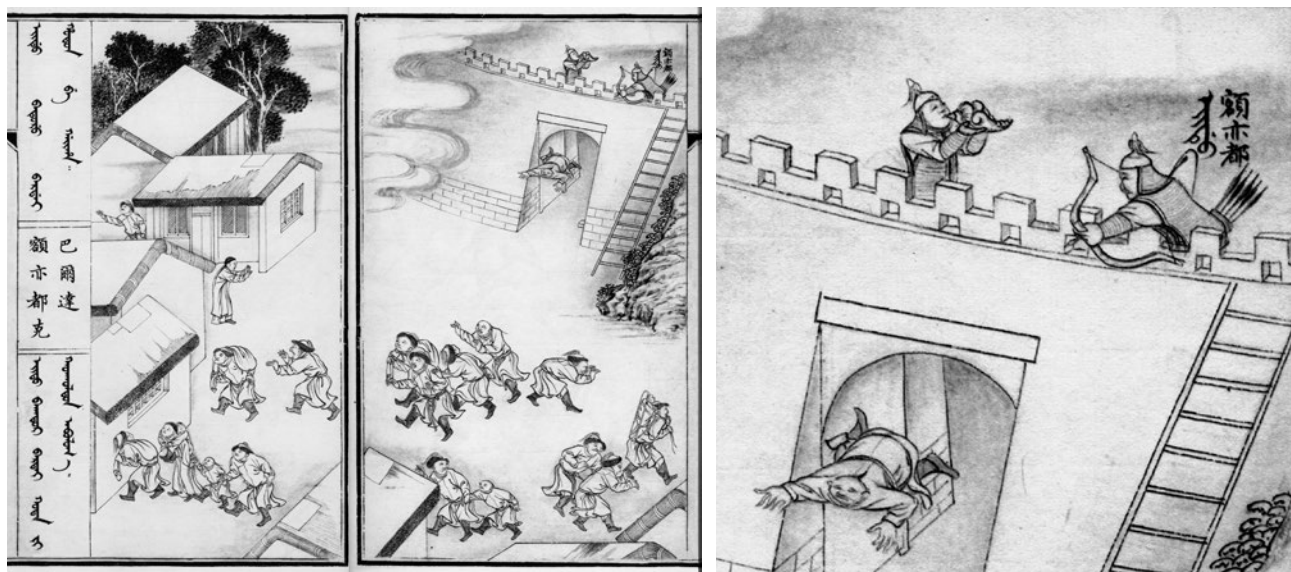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2-1（左）額亦都克巴爾達城，（右局部）額亦都登城射箭 遼寧省檔案館藏 取自遼寧省檔案館整理，《滿洲實錄》，瀋陽：萬卷出版公司，2007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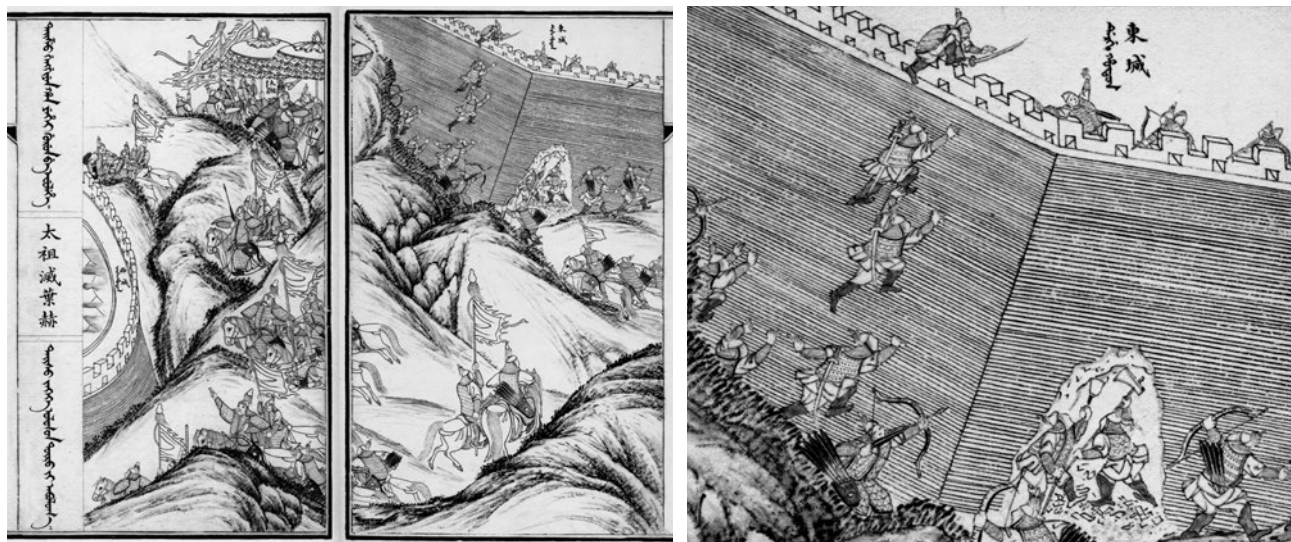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2-2（左）太祖滅葉赫，（右局部）滿洲將士徒手登城 遼寧省檔案館藏 取自遼寧省檔案館整理，《滿洲實錄》。



圖 3-1 滿洲巴圖魯騎射
清 郎世寧 畫瑪璘陣圖 卷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 001098



圖 3-2 金 女真騎馬武士 山西侯馬董明墓出土 取自任萬平主編，《清史圖典》，冊 1，北京：紫禁城出版社，2002，頁 6。

之姿（圖 3-2）。事實上，清初的巴圖魯勇號曾經是賜予極具登城本事的將士。

再參照清初滿文巴圖魯的定義，有助於我們進一步思考此勇號的意涵。康熙年間《御製清文鑑》對於巴圖魯（勇，baturu）的三種定義，其中一種定義即有關賞賜勇號。該辭書首先指出：「持執義、理，氣勢浩然行動，不畏不憚，稱之勇。」（jurgan giyan be jafafi〔持執義、理〕 hoo seme yabume〔氣勢浩然行動〕 gelerakū senguwerakū〔不畏不憚〕 be baturu sembi〔稱之勇〕）；並且引用《論語》（luwen ioi bithe）：「勇者不懼」（baturu urse olhorakū）為例句，加強論述勇者巴圖魯（圖 4）。

其次說明：「登城之人給予勇號。」（hoton fekuhe niyalma de〔對於登城之人〕 baturu colo〔勇號〕 bumbi〔給予〕），此處所說的「登城」，扒城牆、跳城，意即將士攻掠拔城；也直接把登城軍事行動和賞賜勇號直接連繫。接著又說：「軍旅中捨命前進之人，亦稱為巴圖魯男子」（cooha dain de〔軍旅中〕 fafuršame juleri dosire niyalma

be〔把捨命前進之人〕 inu baturu haha sembi〔亦稱為巴圖魯男子〕），⁴同樣強調陣列軍事行動中男子的英勇氣概。可見巴圖魯勇號之賜、巴圖魯男子之名都和清初軍事武功有關。據《清實錄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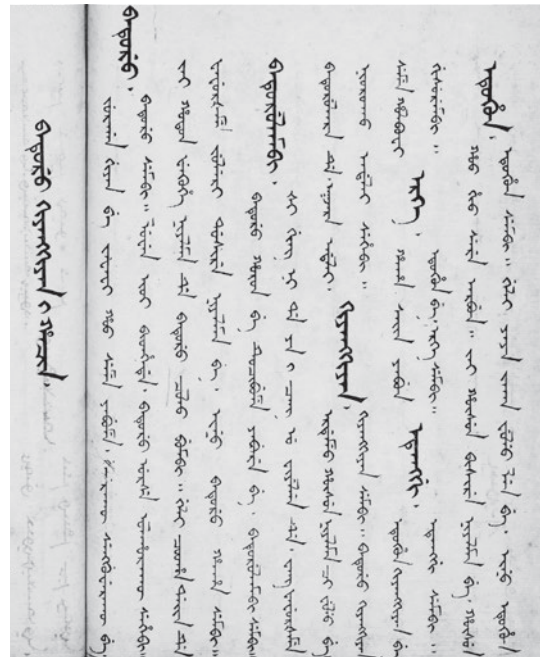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4 清 聖祖敕纂《御製清文鑑》卷 7《勇健類》 清康熙四十七年武英殿刊滿文本 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取自阿爾泰語研究所編，《御製清文鑑（上）》，大邱：曉星女子大學出版部，1978，頁 186。

記載，雍正三年（1725）六月九日，雍正皇帝（1678-1735）也曾諭令引見諸公侯王公等世勳舊臣之子孫，「自二十歲以下，十四歲以上，或十二三歲，而身軀長成者」，希望多加留意文武教育，養成國家人才，其中即包括「登城巴圖魯」子孫。上述如鰲拜、額亦都等早已因包括登城之軍功而受封公爵，也應有更多的「登城巴圖魯」群體成員在清初戰爭中嶄露頭角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到了十八世紀乾隆年間（1736-1796），滿文辭書《御製增訂清文鑑》已調整滿文巴圖魯一詞的釋文，僅限於上述第一點有關勇者以義理無所畏懼之意涵，或因戰爭形態和開國之時已大有變化，勇號並不限於登城之軍功，故調整釋文實有必要。乾隆年間的巴圖魯勇號容後再論。

勇號的英雄旅程

學界一般同意滿語巴圖魯來自於蒙古借詞，蒙古文拼讀如 bayatur，而可能早已流傳於內陸亞洲；⁵ 也都同意歷史上的拔都、把阿禿兒等名號就是早期的用法。至於清朝入關之前接觸此名號的表現，目前最早的記錄很可能是國立故宮博物院藏《滿文原檔》中以老滿文記錄的蒙古林丹汗（1592-1634）和清太祖努爾哈齊彼此書信中的稱號，林丹汗的稱號是「四十萬蒙古國的巴圖魯成吉思汗」，滿文讀如：dehi tumen monggo gurun i ejen baturu cinggis han，此約是 1619 年（天命四年十月）之書信，雖非蒙古文原件，仍可能保留當時林丹汗做為蒙古大汗的稱號（圖 5-1）。⁶ 十七世紀衛拉特蒙古準噶爾部首領巴圖爾琿台吉（Erdeni Batur, ?-1653）亦是擁有此號之例；而直到十八世紀，根據滿文檔案記載，準噶爾部內部也有因部長不准屬民承襲父親之「塔蘇爾海名號」（tasurhai i colo,

tasurhai 乃以滿文音寫蒙古文 tasurqai，意即絕頂的、果斷的），該檔案將之等同於「巴圖魯名號」（baturu colo），加上不堪過度差遣，乃前來投靠清朝的案例。⁷

清朝和準噶爾部長期以來的和戰關係，牽動清朝前期內政外交等變化，據《清實錄》記載，雍正九年（1731）九月十日，雍正皇帝也曾對漠南蒙古進行精神喊話，呼籲共同抵禦準噶爾部，乃諭諸蒙古王公、台吉與弁兵等，若能出群効力，即從優議敘，賜與「世襲巴圖魯達爾漢」之號，使名垂永遠。此處的世襲巴圖魯達爾漢之號，其原語及是否有實際措施尚待考訂，但已顯示此二名號之於滿蒙貴族確實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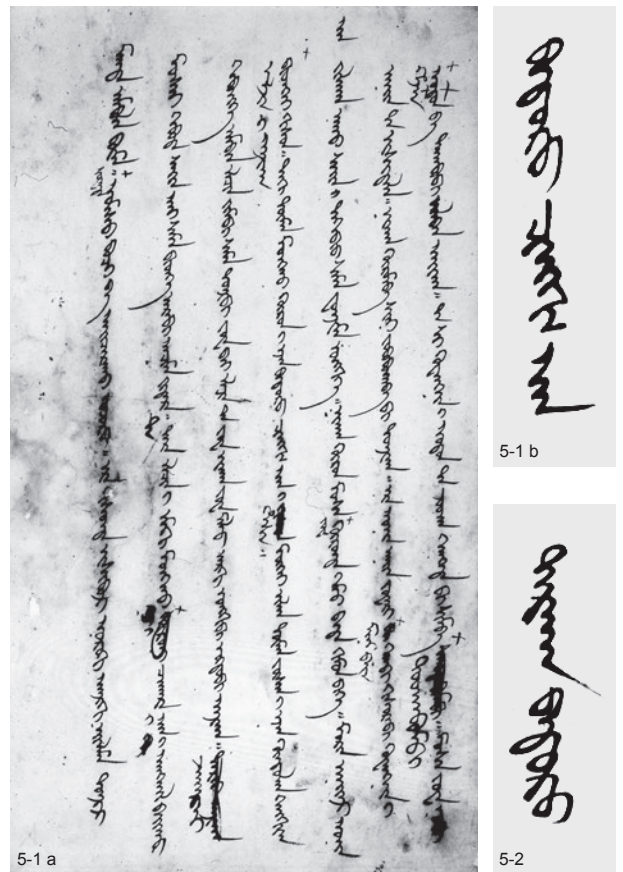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5-1 老滿文「巴圖魯成吉思汗」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閣 001998 取自馮明珠主編，《滿文原檔》，冊 1，頁 300。

圖 5-2 老滿文「達爾漢巴圖魯」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閣 001994 取自馮明珠主編，《滿文原檔》，冊 1，頁 5。

可以名垂永遠的傳統。

至於清朝入關前，滿洲內部使用巴圖魯名號又比上述登城勇號之賜更早，也更顯示蒙古因素為主的內亞特色，從這個角度來看，巴圖魯之號原本並非滿洲內部的唯一選擇。

上述「巴圖魯達爾漢」之號，其實見於《滿文原檔》所記錄的初始部分，描述1607年努爾哈齊和女真烏拉部之間的戰爭，努爾哈齊擊破了女真烏拉部布占泰（1575-1618）後，曾賞賜其弟舒爾哈齊（1564-1611）「達爾漢巴圖魯」名號（圖5-2）；這個稱號結合「達爾漢」和「巴圖魯」，根據N.哈斯巴根對於清代使用「達爾漢」稱號的考察，這是蒙古語 darqan 的音譯，歷來又有答刺罕、打兒漢等寫法，其意涵為得自由、自在之意，原為蒙古大汗、各部部長有權將此號授予立有相應功績者，大多在該號前、後再加其他字詞，以示其榮耀；此號從蒙古傳到滿洲，而皇太極建立大清國號後，達爾漢也是冊封滿蒙貴族採用的爵位名號之一；再據明代蕭大亨（1532-1612）所著《北虜風俗》所描蒙古社會存在四種因軍功而受賜「打兒漢」號，其中「功輕者，升為把都兒打兒漢」（bayatur darqan）；事實上，清朝入關前的稱號大都是使用蒙古語，如努爾哈齊長子褚英（1580-1615）的專稱「阿爾哈圖圖們 aryatu（有謀略）tümen（萬）」，史書多以其意稱之「廣略」；而此達爾漢名號更特別的是，做為世襲之品秩稱號，反映清初某些特權者，見載於清代《理藩院則例》，雖然自皇太極時走向虛銜化，標示為一自由人性質，但此號仍長期使用至清代中期。⁸ 上述北元時期（1368-1388）達爾漢發展的新動向之一，是已經使用巴圖魯和軍功賜號連結，但主要仍是達爾漢稱號為中心；其後，清朝則轉向以巴圖魯勇號為主的賜號，勇號展現滿洲政治文化特色的英雄旅程。

勇者巴圖魯——以號代名的傳統

鄭天挺曾綜述滿洲習俗好以稱號加於人名，多照其心性行徑而定一美名，清初諸王、大臣的名號就是這種表現；而巴圖魯勇號是最常用的，分為只稱巴圖魯的普通勇號，這只有國初才出現，如上述額亦都；此外是加上其他前綴字樣的專稱勇號；而最初這些滿蒙語稱號，是用以代表本人名字，稱號就不再稱原名；但後來官書體例在稱號之下仍列入本人原名，例如，《武皇帝實錄》卷三，天命五年（1620），「九月皇弟青把土魯薨」，其後《東華錄》作：「九月甲申，皇弟青巴圖魯貝勒穆爾哈齊薨」，後代史官追改之舉和賜號的原意不符。⁹

勇號（baturu colo）亦可謂巴圖魯名號，所謂的號、名號、別號，滿語讀如 colo，《清文鑑》也有釋義：「敬重著呼喚之名，稱之 colo」（wesihuleme hūlara gebu be colo sembi），可知「號」在滿語角度，基本上也是一種「名」（gebu）；「名」則是「自年幼起做為標誌而指稱者」（ajigen ci temgetu obufi jorime hūlarange be gebu sembi）；類比於爵號之「爵」、職位、官銜，滿語讀如 hergen。¹⁰ 故鄭天挺指出的稱號、勇號原先可取代本名，應有其傳統背景。

成書於雍正年間的滿漢雙語教材《清文啟蒙》，其卷二所示多篇滿漢問答也提及字號尊稱的現象，旗人對教授讀書、騎射的老師其名號說法，頗值得分析。其中有一句「趙師傅的號兒叫什麼字兒？」對應滿語：joo sefu i colo be（把趙師傅的號）ai ama sembi（稱做什麼阿瑪），此處「號兒」即是滿語 colo，而「字兒」滿語則使用「什麼阿瑪 ai ama」，即已預設將會得到「某某阿瑪」的回答，其回答正是「叫作拙哩阿瑪」（jooli ama sembi）。由此可知，對於授業老師，旗人社會可以尊稱為某某阿瑪，滿語阿瑪 ama

一般指血緣關係裡的父親，也可以是如同父親般的敬稱。¹¹ 對尊長稱號，「字」也如漢人的用法，此處表示滿人社會直接以阿瑪為字號的一部分。或許「某某巴圖魯」也應是相似表現，只是巴圖魯勇號直接來自於皇權。

再參照有著「最後八旗」之稱的新疆錫伯族的起名習俗，包括以祖父年紀為本的數字起名、以出生順序、物品、動植物、祈請上進和吉祥等等，其中以體形和長相起名者，若小孩長得強健，就叫「巴圖爾拜」（*baturbai*），這也和滿語巴圖魯之名同義。另外，也有起綽號的習慣，主要根據長相、某些舉動，以及父母的特點，錫伯民間社會裡的綽號倒是多具有貶義，而綽號往往又比本人的真名流傳的更廣泛，使得有些人至死不被叫真名，而其綽號則始終為人所知。¹²

既有嘉名也就有醜號的存在，而相對於巴圖魯勇號，我們也可以看到皇權改起醜名的現象，《清實錄》即載乾隆五十七年（1792）三月九日，駐藏大臣保泰（?-1802），因處理廓爾喀侵藏事件失利，被皇帝以重要軍情徇隱不奏治罪，並改其名曰「俘習渾」，滿語讀如 *fusihūn*，乃卑賤之意；至於雍正皇帝將其政敵兄弟另改的醜名，則流傳更廣，此處限於主題不論。

巴圖魯者勇冠軍

乾隆年間的入主西域戰爭，除了產生大量標舉軍事文化的圖書編纂和圖像繪製，同時也是巴圖魯勇號進一步提昇知名度的關鍵年代。乾隆二十一年（1756），準噶爾戰爭陷入膠著，乾隆皇帝（1711-1799）曾親作〈御製三巴圖魯歌〉紀念三位勇士，此詩作收入《欽定皇輿西域圖志》等官書，其首四句為：「巴圖魯者勇冠軍，昔我旗人頗恆有。近世以來殊不聞，蓋因太平日已久。」欲將清初名臣的事功相較，此詩歌

其實提到四位巴圖魯：「舒布圖鎧已超羣，三巴圖魯亦赳赳。」他們除了擁有巴圖魯勇號，還名列為表彰功勳的「紫光閣五十功臣」、「紫光閣次五十功臣」，畫有圖像，題有贊詞，同樣收入《西域圖志》等官書。

這裡乾隆皇帝先緬懷舒奇徹布（生卒年不詳），原頭等侍衛舒布圖鎧巴圖魯，這位名列皇帝親撰〈紫光閣五十功臣〉贊詞之第三十九位：「包沁之叛，千賊一身，賜巴圖魯，昉乎斯人；後復屢戰，喪哈薩克，始終於是，曷勝悼惜。」其勇號前面冠有「舒布圖鎧」，此或取義蒙古語 *sibtuly_a*，突擊之義。至於詩歌主角三巴圖魯，分別是：原二侍衛哈布臺巴圖魯富錫爾（生卒年不詳），名列〈五十功臣〉之第四十五位，另二位列入由詞臣題寫的〈紫光閣次五十功臣像贊〉，原領隊大臣察哈爾總管坤都爾巴圖魯巴寧阿（生卒年不詳），名列第二十一；頭等侍衛卓里克圖巴圖魯額訥慎（生卒年不詳），名列第三十四，除了以詩歌描述事蹟，乾隆皇帝還親自解釋其勇號名義：「賜額納仲曰卓禮克圖巴圖魯，卓禮克圖者，節義卓爾永不渝。賜巴寧阿曰昆都爾巴圖魯，昆都爾者，力敵萬人暇有餘。賜富錫爾曰哈布臺巴圖魯，哈布臺者，穿楊貫石技不殊。」卓禮克圖巴圖魯，其滿語「卓禮克圖」*zoriktu* 應是來自蒙古語 *zoriytu*，意即無畏的、意志堅強的；昆都爾巴圖魯，其「昆都爾」應與蒙古語 *kündülekü* 有關，意即敬重、榮耀；哈布臺巴圖魯，其「哈布臺」應與滿語 *gabtambi*，蒙古語 *qarbuqu* 有關，亦即射箭。

〈紫光閣五十功臣〉具有巴圖魯勇號者，有十八名，而〈次五十功臣〉受賜勇號者則更高達三十三名，事實上，即使沒有勇號而名列前位、授以爵位者，如大學士一等忠勇公傅恒、

邊將軍一等武毅謀勇公戶部尚書兆惠、原定北將軍一等誠勇公兵部尚書班第等，亦有「勇」字稱號，也應對應滿語巴圖魯 baturu，從滿文來看也都是巴圖魯。其後的「平定」金川之役的前後共一百名紫光閣功臣、「平定」臺灣林爽文（1756-1788）之役的前後共五十名紫光閣功臣，他們大多都獲有巴圖魯勇號，乾隆年間「十全武功」究竟產生多少巴圖魯仍待統計，此不詳述勇號特色。

乾隆皇帝以三位軍功英雄稱之「三巴圖魯」之舉更早可見於乾隆二十年（1755）五月題寫的〈平定準噶爾勒銘格登山之碑〉御製碑文，表彰第一次「平定」準噶爾戰爭期間，於格登山（今新疆昭蘇縣境）發生的一場夜襲準噶爾汗達瓦齊（?-1759）大營之戰，此戰役不久達瓦齊即被活捉獻俘，是故以喀喇巴圖魯阿玉錫（?-1768）為首的「三巴圖魯」居功厥偉。碑文記載另二位厄魯特章京巴圖濟爾噶爾（?-1772）、宰桑察哈什（生卒年不詳）等以銳兵二十二人成功夜襲；乾隆皇帝也另撰〈阿玉錫歌〉讚揚其人其事，這些御製文獻均記載於《西域圖志》。阿玉錫和巴圖濟爾噶爾因此列名〈紫光閣五十功臣〉，領隊大臣內大臣副都統巴圖濟爾噶爾名列第二十六；其名「巴圖」二字是原名 Batujirgal 的一部分，惟官書或把「巴圖」添寫成「巴圖魯」，這也許是受到紫光閣功臣的衆多巴圖魯的影響。散秩大臣喀喇巴圖魯阿玉錫位列第三十三：「於格登山，賊據險守，率廿四人，間道襲後；諸賊大潰，爰以成功，本厄魯特，降順効忠。」他是三人中唯一有巴圖魯勇號者：「喀喇巴圖魯」，滿蒙語均有「喀喇」一詞，滿語 kara 借自蒙古語，此號當取義蒙古語 qar_a，意即黑色的、猛烈的，恰巧搭配其圖像中所騎乘的黑馬；惟阿玉錫獲得此號在

格登山戰役之前。至於察哈什因不久後即依附阿睦爾撒納（1723-1757）反清，原本「三巴圖魯」都是來自準噶爾汗國的投降降人，至此也分屬敵我二陣營（圖6）。

和阿玉錫同樣具有高知名度的西域戰爭功臣是〈紫光閣五十功臣〉位列第二十五的領隊大臣前鋒統領墨爾根巴圖魯瑪瑞（?-1769）：「侍衛從征，奇功屢立，雖賊萬衆，單騎直入；陷陣馬仆，距躍彎弓，賊人咋舌，稱天上雄。」



圖6-1 清 散秩大臣喀喇巴圖魯阿玉錫 軸 天津博物院藏 取自羅崇正，〈從稿本到正圖的紫光閣功臣像〉，《紫禁城》，2015年10期，頁130。



圖 6-2 清 郎世寧 畫阿玉錫持矛盪寇圖 卷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 001099



圖 6-3 阿玉錫夜襲

(左) 清 郎世寧等 《平定伊犁回部戰圖》 彩繪本 局部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取自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編，《故宮博物院清代新疆文物珍藏展》，烏魯木齊：新疆人民出版社，2011，頁 26-27。

(右) 清 郎世寧繪 《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·格登山斫營》 正式本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 021228



圖 6-4 巴圖濟爾噶勒夜襲

(左) 清 郎世寧等 《平定伊犁回部戰圖》 彩繪本 局部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取自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編，《故宮博物院清代新疆文物珍藏展》，頁 26-27。

(右) 清 郎世寧繪 《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·格登山斫營》 正式本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 02122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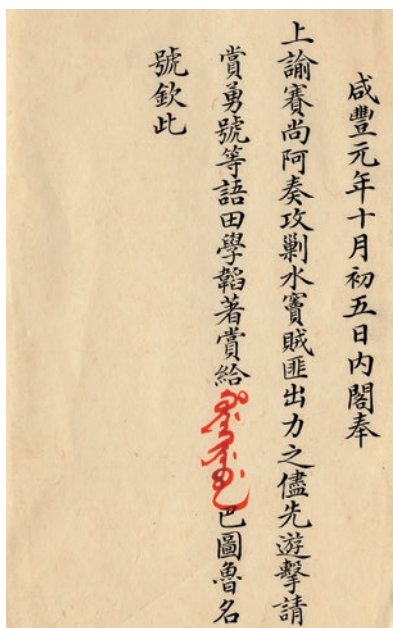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7 霍伽本 (huwekiyebun) 巴圖魯
清 內閣 〈奉上諭著賞田學韜巴圖魯名號〉
咸豐元年 10 月 5 日 (1851.11.27) 國立故
宮博物院藏 故宮 134037



圖 8 福建水師提督健勇巴圖魯—蔡攀龍
清 賈全 御筆平定臺灣二十功臣像贊 卷 局部 私人收藏 取自聶崇正, 〈從稿本到正圖的紫光閣功臣像〉, 頁 125。

乾隆皇帝另撰〈墨爾根巴圖魯瑪瑞斫陣歌〉嘉其行，而其勇號所冠之墨爾根一詞，滿漢文均有，或為自早期蒙古語傳入滿—通古斯語族，讀如 *mergen*，意即睿智（見圖 3-1）。

勇號前綴形容字詞的決定過程尙待進一步探究，最後必定是皇帝欽定，目前可見一份咸豐元年（1851）賞賜田學韜（?-1852）勇號的漢字上諭，諭旨留有空白，由皇帝以硃筆寫下滿文 *huwekiyebun*，漢字音寫為霍伽本，意即鼓勵、激勵（圖 7）。鄭天挺認為清字（滿文）勇號和漢字勇號沒有區別，語文不限於該族群使用，滿人福康安（1754-1796）於金川之役期間受賜漢字「嘉勇巴圖魯」。然而勇號所冠稱的形容用詞並不限於滿漢文，除了上述的蒙古語，亦有藏語。¹³除了名列紫光閣者，也有一般平民獲得巴圖魯勇號，以乾隆年間牽動臺灣眾多群族的林爽

文事件為例，當時也有兩位漢人平民受封巴圖魯，俱為「義民」，《清實錄》載乾隆五十三年（1788）三月二十一日，原籍廣東的舉人曾中立，於六堆牽制反清之莊大田部勢力有功，加恩給與「義勇巴圖魯」名號；固守諸羅之武解元黃奠邦賞給「順勇巴圖魯」名號。漢字巴圖魯號今人較容易理解，鄭天挺已指出，漢字勇號全用兩個字，而後一字通用「勇」字，故只在前一字有所變化，惟林爽文事件中臺灣鎮總兵柴大紀（1732-1788）曾獲賜「壯健巴圖魯」，而名列紫光閣二十功臣之蔡攀龍（1738-1798）則賜號「強勝巴圖魯」應是僅有的例外（圖 8）。

此外，晚清時期由於軍事正亟，勇號賜予亦多，乃至出現無問文武、重覆賜號等現象，也有武臣立功由漢字勇號改賜清字或蒙古字勇號的「晉號」現象。臺灣霧峰林家林文察

(1828-1864) 於咸豐九年 (1859)，遠赴福建麻沙參與小刀會民變，獲賜「固勇巴圖魯」；隔年，轉戰浙江，與太平軍戰鬥卓有軍功，獲賞「烏訥思 (恩) 齊巴圖魯」。¹⁴ 特別的是，烏訥思 (恩) 齊並非漢字，或是和蒙古語 *ünenči* 有關，意為誠心誠意、忠心耿耿的，應屬晉號現象。又如擁有「晚清第一巴圖魯」之譽的鮑超 (1828-1886)，原先賜漢字號「壯勇巴圖魯」，禡奪後又以援曾國藩 (1811-1872) 於祁門之功，賜號「博通額巴圖魯」，此例或與晉號不同，

卻是改授清字勇號之例，「博通額」可指滿文 *bodonggo*，意即策略、計畫；或 *bodohonggo*，有謀略的。

至於洋人得到清廷賞賜勇號者，似乎只有參與太平天國之役的法國人畢乃爾 *Pinel* (*Pennelo*，生卒年不詳) 一人，其中文名為畢華清 (畢華青)，原於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來華，後於上海為淮軍效力，曾受賜「法什尙阿巴圖魯」。¹⁵ 「法什尙阿」為滿語 *faššangga* 之音譯，意即有功業的；畢乃爾本人是否知道此滿語字



圖 9-1 (左) 1875 ~ 1908 帶有古代和現代硬幣的刺繡無袖夾克 (琵琶襟坎肩) 費城藝術博物館藏，(右) 1800 ~ 1900 兒童紅色羊毛背心 (一字襟坎肩) 賀新忠收藏 取自 Harrison-Hall, Jessica, and Julia Lovell, eds. *China's Hidden Century 1796-1912*. Seattle: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, 2023. 208, 233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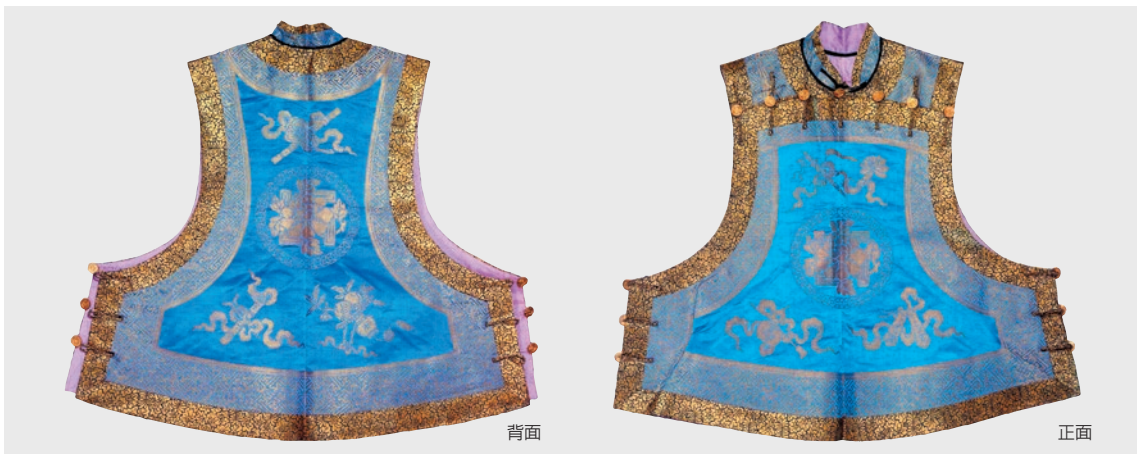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9-2 清 月白色暗八仙團牡丹萬字紋織金緞夾坎肩 (十三枚扣、一字襟坎肩)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故 47958 取自嚴勇、房宏俊、殷安妮編，《清宮服飾圖典》，北京：紫禁城出版社，2010，頁 286-287。

義尙待考察。

把洋人視為巴圖魯的例子倒也出現在晚清。參與《南京條約》談判的張喜，其記錄談判過程的私人筆記《撫夷日記》對於英方代表璞鼎查（Sir Henry Pottinger, 1789-1856）等擁有勳爵名號者，如 G.C.B、K.C.B、C.B. 三個等級的巴斯勳章，《撫夷日記》將之與巴圖魯勇號分別對應：頭等尊烈巴圖魯、二等尊烈巴圖魯和三等巴圖魯。¹⁶ 巴圖魯成為當時張喜自己加給對方的勳爵名號，這也顯示巴圖魯勇號在幕僚人員的認知裡所具有的深刻社會性意義。

由於長期使用巴圖魯勇號，以巴圖魯之名成為社會用語的事例，亦可進一步發掘。

巴圖魯的穿搭與穿越

「巴圖魯坎肩兒」在清代文獻時有記載，徐珂（1869-1928）於《清稗類鈔·服飾類》說是京師盛行的滿族服飾，各部司員見堂官往往服

之，上加纓帽；其由來一說是漢族「半臂」，南方也稱背心、搭護，又稱「一字襟馬甲」，主要特徵是無袖、兩側開襖、衣長及腰，四周鑲邊，胸前至兩肩處橫列 13 顆鈕扣，聯其上下片，俗稱「十三太保」，兩腋下亦以鈕扣聯其前後片。另說原先為朝廷要員之衣著，故又稱「軍機坎」，後來一般官員、八旗子弟皆穿著，成為一種半禮服。初用皮製，襯於袍內，乘馬或行走熱時，探手衣內解開鈕扣，即可褪下，免脫外衣之累。坎肩，滿語讀如 dehele，應和 dehe 鈎子、魚鈎有關，背心形式如同鈎子掛在身上，且強調以皮製作，漢文亦稱「皮掛」、「齊肩短掛」（圖 9）。

後來有也流行使用單夾棉紗，並且改製為加上兩袖，曰「鷹膀」，宜於乘馬，步行者不能著。¹⁷ 《紅樓夢》第四十九回即寫到某次賈寶玉只穿一件茄色哆羅呢狐皮襖子，單一件海龍皮小小「鷹膀褂」，鷹膀也可謂是當時新興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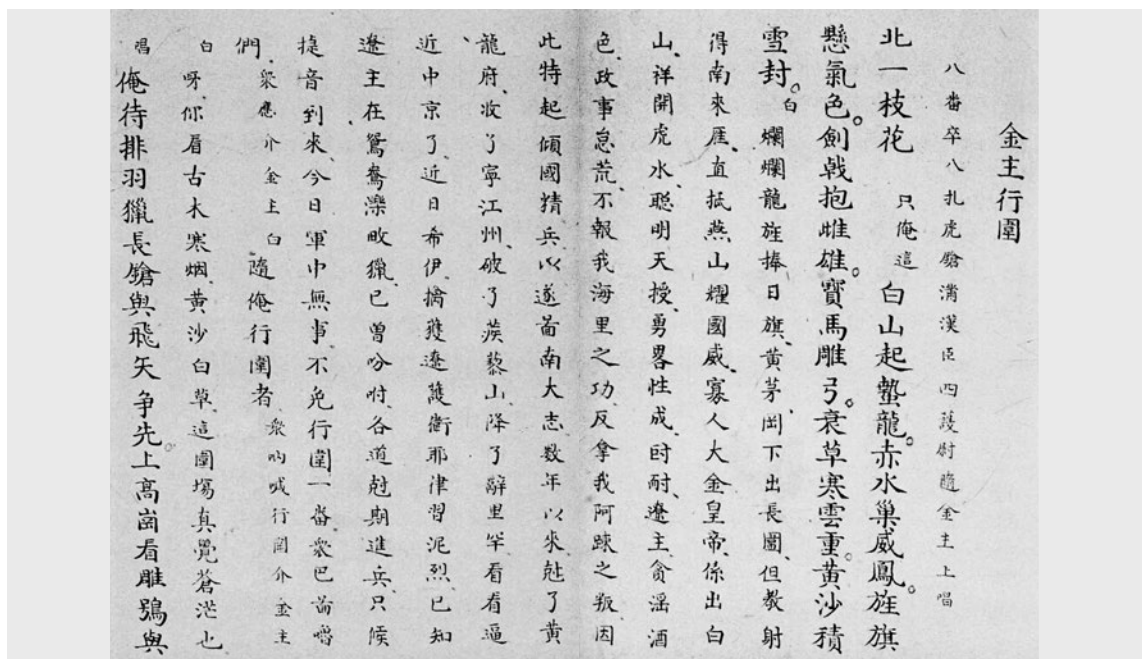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10 清代京劇《金主行圍》裡的衆巴圖魯 取自中國國家圖書館編纂，《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宮昇平署檔案集成》，冊 78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1，頁 44759-44760。

尙的服飾。

又旗人文康（1794-?）所著《兒女英雄傳》第十五回描述衣飾，除了頭戴窄沿氈帽，身穿箭袖棉襖，再套一件倭緞廂沿加廂「巴圖魯坎肩兒」的絳色小呢對門長袖馬褂兒等穿搭，十分講究。

至於以巴圖魯之名形容帥氣的騎馬英雄，也可見於《兒女英雄傳》第三回：「我們這位小爺只管像個女孩兒似的，馬上可『巴圖魯』，從小兒就愛馬……。」巴圖魯似乎是當時京語裡的普遍用語。

何以巴圖魯是個普遍用語？這從京劇裡大量使用巴圖魯一詞即可以證明。趙志忠指出，在京劇發展過程中，滿族文化多有滲透，其一是京劇中增加了一些滿語，有的編入整段滿語，而最典型的就是使用巴圖魯一詞；據說，民國初年《挑滑車》劇中的金兀朮就有一段滿語唱詞，但後來只留下巴圖魯一詞（圖 10）。¹⁸ 京劇裡從上古到清代的各種番兵、士卒，都有機會被呼做「巴圖魯」，故事衆多，歷史背景包括春秋時代衛懿公《好鶴失政》、西漢時代《蘇武牧羊》、王昭君《漢明妃》、北朝《花木蘭》等，宋遼金時代《風波亭》、明清之際《山海關》等，而外邦部長和其士卒在劇本中常以狼主和巴圖魯代稱，巴圖魯在戲劇舞臺上彷彿可以穿越時空；以乾隆年間西域戰爭為背景的《香妃恨》，小和卓木霍集古（?-1759）慷慨陳詞，極力主戰，對抗清兵，劇中的巴圖魯竟成了回部的勇士。¹⁹

傳統戲裡的滿語只能隨著改朝換代而退出歷史舞臺，而巴圖魯仍具生命力。清末八旗軍裡的〈巴圖魯歌〉轉而成為黑龍江地區的滿族民歌（圖 11）。當代滿族作家也還使用巴圖魯、莫爾根等詞彙；滿族歌曲也運用白山黑水、海東青、巴圖魯等傳統元素，進行創作；著名滿族歌曲創作者宋熙東，本名阿克善（Akšan），

巴 圖 魯 歌^{*}

黑·依兰县

1 = F

中速

$\frac{2}{4}$ 5 $\dot{1}$ | $\dot{1}$ 6 5 | $\dot{1}$ 6 5 | 6 0 | $\dot{1}$ $\dot{1}$ | $\dot{1}$ $\dot{1}$ 6 5 | 5. 3 |

战云卷起了牛皮鞞，八旗巴图鲁冲

$\dot{2}$ 1 | 1 | 5. 6 | 6 2 | $\dot{1}$ | $\dot{1}$ 6 | $\dot{1}$ | $\dot{1}$ 6. | 5 $\dot{1}$ 6 | 5. 6 5 3 |

向前，哲，哲，哲，哲，勇敢的巴图鲁

5. 3 | 2 1 | 2 - | 5 $\dot{1}$ 6 | 5. 6 5 3 | 5 3 2 1 | 1 - ||

鄂伦浑得，勇敢的巴图鲁 鄂伦浑得。

（傅英仁唱 可心记）

* 此歌为清末八旗军中流行的歌曲之一，由演唱者的父亲传授。巴图鲁：满语，汉译：英雄的意思。

圖 11 巴圖魯歌 取自黃禮儀、石光傳編，《滿族民歌選集》，北京：人民音樂出版社，1999，頁 45。

其採訪記錄提到認識他的東北老滿族人喜歡叫他巴魯圖；作曲家隋利軍（1952-2024）關注滿族音樂理論，創作作品《關東秧歌》與《巴圖魯戰神之舞》唢呐協奏曲，也曾在臺灣演出。²⁰

結語

清初大量使用蒙古語做為賜號語詞，巴圖魯原非唯一的選擇，賜號原可取代本名，稱號之號，即尊名之名，後來清朝以巴圖魯賜號，勇號乃成為主流。回顧巴圖魯勇號的英雄旅程，歷經借詞、登城巴圖魯，以及結合滿蒙漢藏等語詞而成的各式各樣的具有表彰軍功的勇號，如此一個內亞背景的滿洲詞彙，竟被清政權長期用以表彰軍事功勳，可謂以巴圖魯串連起整個帝國的軍事文化，進而成為社會流行用詞。巴圖魯可用來指稱坎肩衣服，更成為章回小說和口傳文學所描述的帥氣英雄，乃至於穿梭於戲曲裡不同時空背景的兵丁士卒。而時至今日，巴圖魯之名因其承載的歷史與記憶，仍是各種藝文作品裡極具滿洲特色的創作元素。

作者為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

註釋：

1. 金庸，《鹿鼎記》（北京：寶文堂書店，1990），韋小寶和一群布庫（滿語 buku，摔跤手）生擒鰲拜見冊一，第五回，頁 204-213；刺死鰲拜見冊一，第七回，頁 299-305；皇帝賜勇號，見冊四，第三十四回，頁 191；施琅所言見頁 210。
2. 有關鰲拜的口傳故事可參見：富育光講述、王慧新整理，《鰲拜巴圖魯》（長春：吉林人民出版社，2018）。
3. 《欽定國史大臣列傳正編》，卷 36，〈鰲拜列傳〉，國立故宮博物院藏，故傳 005690/701005673。
4. （清）聖祖敕纂，《御製清文鑑》，卷 7，〈勇健類〉，收入阿爾泰語研究所編，《御製清文鑑（上）》（大邱：曉星女子大學出版部，1978），頁 186。《御製增訂清文鑑》對於釋文的調整參見卷 12，〈人部三·勇健類〉，頁 9，收入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6，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影印），冊 232，頁 390。
5. William Rozycki, *Mongol Elements in Manchu* (Bloomington: Indiana University, 1994), 26; 勇號之號，滿語讀如 colo，亦是近代蒙古借詞，參見頁 50。
6. 馮明珠主編，《滿文原檔》（臺北：沉香亭出版社，2005），冊 1，頁 300。「巴圖魯成吉思汗」稱號至少有三處，另見頁 318、321。
7. 定邊左副將軍成袞扎布等奏，〈厄魯特布圖遜等自準噶爾來投並審明解送京城摺〉，乾隆十六年六月二十一日具奏，二十九日奉硃批，吳元豐、厲聲主編，《清代新疆滿文檔案漢譯匯編》（桂林：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20），冊 8，頁 96-97。原文另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，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編，《清代新疆滿文檔案彙編》（桂林：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12），冊 8，頁 235-239。
8. N. 哈斯巴根，〈清初達爾漢名號考述〉，《清史研究》，2012 年 2 期，頁 112-115。該文引用《北虜風俗》的四種達爾漢稱號：「功輕者升為把都兒打兒漢，功重者升為威靜打兒漢，再重者升為骨印打兒漢，最為首功，則升至威打兒漢而止。」
9. 鄭天挺，〈清史語解·巴圖魯〉，《清史探微》（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17），頁 132-137。該文是較早全面介紹巴圖魯勇號的專論，包括各種冠加清字（滿文）、漢字的巴圖魯勇號之特徵亦有說明，本文關於晉號的相關描述即引伸自該文。
10. 《清文鑑》、《增訂清文鑑》等詞書釋義，參見「モンゴル諸語と滿洲文語の資料検索システム」<http://hkuri.cneas.tohoku.ac.jp/>（檢索日期：2025 年 4 月 9 日）。
- 11.（清）舞格，竹越孝、陳曉校注，《清文啓蒙》（北京：北京大學，2018），卷 1，頁 420；序於雍正八年，卷 2，〈兼漢滿洲套話〉，頁 34b。此處「拙理」jooli 應是趙 joo 的進一步轉化，以適應旗人社會對於漢語字詞的使用。
12. 賀靈、佟克力，《錫伯族風俗志》（北京：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，1994），頁 46-49。
13. 綦中明，〈清代巴圖魯封號及其文化內涵〉，《山西師大學報（社會科學版）》，38 卷 6 期（2011.11），頁 124-127；綦中明、劉麗華，〈清代 baturu（巴圖魯）賜號考略〉，《湖南廣播電視大學學報》，2015 年 1 期，頁 17-23。該文介紹若干勇號前綴的滿、蒙、藏文形容字詞，但沒有說明意思，拼音亦有待商榷。
14.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，《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檔案史料》（北京：光明日報出版社 1990），冊 23，頁 48，咸豐十一年二月初九日內閣奉諭。筆者按，烏訥思齊或為烏訥「恩」齊之訛，待進一步考察。
15. 張瀚洋、蕭寒、衛子豪，〈淮軍「洋教頭」畢乃爾生平探析——基於新發現的史料〉，《皖西學院學報》，31 卷 6 期（2015.12），頁 109-112。
16. 王亞楷、李鰲哲，〈圖像中的《南京條約》：鴉片戰爭中英交涉史實新釋〉，《近代史研究》，2023 年 1 期，頁 90-91。
- 17.（清）徐珂，《清稗類鈔·服飾類》，檢自「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」<https://ctext.org/wiki.pl?if=gb&chapter=291167>（檢索日期：2025 年 4 月 9 日）；另參見孫文良主編，《滿族大辭典》（瀋陽：遼寧大學出版社，1990），頁 116-117；王云英，《清代滿族服飾》（瀋陽：遼寧民族出版社，1989），頁 34-36。
18. 趙志忠，〈滿族與京劇〉，《滿族研究》，2004 年第 1 期，頁 49-54。惟後來出版的《挑滑車》劇本連巴圖魯也刪去，參見中國戲曲研究院編，《京劇叢刊》第一輯（上海：新文藝出版社，1953），頁 87-115。
19. 以上各劇參見「中國京劇戲考」資料庫 <https://scripts.xikao.com/search?q=%E5%B7%B4%E5%9B%BE%E9%B2%81>（檢索日期：2025 年 4 月 9 日）。
20. 范慶超，〈論當代滿族作家的滿語使用〉，《滿族研究》，2018 年 1 期，頁 98-103；蕭寒演唱，連博作詞，〈滿洲利亞〉，《Albert Gioro》（2020 年 5 月 5 日）<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apkGn33YBag>（檢索日期：2025 年 4 月 9 日）；吳迪，〈宋熙東：英雄的後代怎能將故鄉遺忘〉，《中國民族》，2012 年 11 期，頁 22-25；林祐正，〈中國東北風情韻演奏之探討——以《關東秧歌》、《巴圖魯戰神之舞》為例〉（臺南：國立臺南藝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碩士班碩士學位論文，2019）。